

转型中的社会治理

——和谐社会构建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

编著 \ 顾建键 马西恒 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的理论自觉和对完成执政使命必然要求的科学把握。社会建设既是我国改革中期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社会体制创新的基本过程。本书围绕政治社会学视野中的执政党的建设、城市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结构整合以及实践操作层面的社会建设路径三大主题,对执政党的建设与社会利益整合、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下的社会作用、化解社会利益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和谐的价值平台、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推进社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书可供研究社会建设问题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阅读,对从事党的社会工作的同志帮助更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中的社会治理:和谐社会构建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 / 顾建键等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ISBN 7-313-04388-0

I. 转... II. 顾...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研究 - 中国 ②城市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6②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6209号

转型中的社会治理

——和谐社会构建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

顾建键 马西恒等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877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张天蔚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335千字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313-04388-0/C·089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社会学在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责任

李友梅

(上海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大有作为的时期,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必然要作出积极的响应,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实践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是一门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对预测社会发展走势、揭示现代人类合作机制的变化、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的科学理性。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同时坚持一种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① 这种发展观,也正是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所坚持的价值取向。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变。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对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的组织方式、关系风格、合作机制、结构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本质变化以及对社会生活的重组借助了什么样的制度构架

^① 胡锦涛. 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实,社会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变化能够有贴切的反映。也正因为此,“成为社会现实的身影”是许多社会学研究者自觉追求的目标。

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现实”其主要特征通常被概括为:外部生活世界给予个人的约束,这些约束具有强制性(比如法律、道德规范、货币制度等);人们是根据这些强制性约束的作用来认识社会和对社会进行反应的(比如个人若将某些约束内在化,使之成为自己的意愿,就不会感到它们的强制性);外在于个体意识的行为方式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并非来自大量个体事实的总和,而是来自集体属性。^①可见,关于“社会现实”这一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不同于一般的日常话语。它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属性和基础,而且涉及这些关系所寓于的多重制度结构以及这些关系与这些制度的互动方式。因此,社会学研究要获得有效的成果,就必须以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作为其思考的出发点,而不能简单地从理论的源头出发。

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普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首先考虑的往往不是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而是考虑应当借用何种理论范式,而且这些理论范式通常是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所引用的社会理念是否是成熟的社会理论?它们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否具有贴切的适应性?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有一个从社会生活中提取、抽象、建构的过程。西方社会学理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学家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并对社会现实总结概括的结果。随着西方社会学家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的进一步深入了解,它们还会被不断修正。当我们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即使是西方国家已经很成熟的理论,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也未必完全具有适应性,因为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在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上有着重要差异,更何况理论本身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中

①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耿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国社会学要真正能够为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不能不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并且要在科学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对社会学理论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社会学发源于法国,其最初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们按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对社会现象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社会学在这个专门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独特个性。随着这个专门化的持续,社会学自身又出现了一种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延伸和渗透的新趋势。比如,传统的政治学大多限于对政府权力的研究,而社会上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力却多种多样,这些权力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们相互之间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当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时,便出现了“政治社会学”。又比如,传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供求关系、物价起落等,而社会上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变动,满足这些需求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很多活动并不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里进行,于是又产生了“经济社会学”。^①这样,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最终使自己成为一门比较善于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学科。

综上所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进行观察和研究,但人类社会当代的快速发展并日趋复杂化的局面,使社会学研究工作无不感觉到他们面临着重要的挑战,因而意识到理论创新的迫切性。确实,在当今发达社会,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学研究者,不但要在本学科领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对包括本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保持敏锐性,这就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理论知识以及融会贯通等一系列能力。可以说,社会学研究要在当代发达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成果不仅应当为其他学科提供有益的借鉴,并且能够对现实社会的需要及时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反应。

然而,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后,其学科重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质性进展,以某种方式说,中国社会学当前尚处于建设的

^① 费孝通. 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J]. 天津社联通讯, 1980, 10: 5.

初期阶段。因此,它要真正能够推进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要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积累,另一方面还要以创新的举措寻求突破性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在促进自身进步的过程中,既要遵循学科的发展规律,又要摆脱传统思路的束缚,去开创学科建设高速发展的新路子。

显然,对中国社会现实作出深刻了解可能会碰到许多困难。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它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在这个国家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就很难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难以真正理解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急剧变迁的年代,许多社会现象都转瞬即逝,使人无暇思考。但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是有某些因果链相联系的,比如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融或冲突,与不同权力间的交换、联盟或妥协这样一些过程相联系。因此,当我们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就需要对之作一些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会有这样的认识: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有可能传统中找到根源。而要真正接近这样的社会生活,人们必须掌握并有效地运用那些有助于理解和揭示其运作机制的分析工具。这就又提出了如何确定分析工具的问题。

当我们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总会考虑去选择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作推论。有学者认为,理论和方法犹如社会学研究者的“双脚”,彼此难以分离。只有在成熟的理论和恰当的方法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合法性。但我们的研究不能仅是这个追求,因为我们的研究成果要被社会所接受,就不仅要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变化作出学理上有效的反应,而且同时要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逻辑作出有效的反应。因此,我们有责任探索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以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更好地为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序 二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社会构建

顾建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任务,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建设领域的理论自觉和对完成执政使命必然要求的科学把握。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特征包含了制度设计、价值理念、公民素质、发展动力、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等社会建设的多重规定性。它既是治国理想,又是治国方略和机制,也是治国结果和目的,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更趋完善,标志着我们党完成了从革命到建设的最终转型,也是我们党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贡献。

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解决了靠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发展得更快更好等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和作

用。人、社会和自然从来就是相一致的。人组成了社会,社会是人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人、社会依托自然界而存在。把推进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性。和谐社会的构建,既使科学发展观强大的理论引领作用获得充分展现,又使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落实具有坚实载体和稳固平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协调有序,使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融为一体。只有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一致性,科学地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并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产生强大推动作用,辩证地把握和谐社会构建过程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过程,也是科学发展观不断接受检验并进一步丰富发展的过程,才能真正把和谐社会建设好,使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巨大物质力量。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社会构建,在中央总体工作部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反映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再到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社会构建,反映了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日益完整全面,工作布局与重点更加合理明确。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目前中央“四位一体”总体工作部署的基本框架。物质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精神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而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与环境,也是“三个文明建设”成效的最终检验,四者形成了高度的有机统一。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抓经济等建设比较明确、抓社会和谐与稳定比较抽象的问题,使各项工作在总体布局上形成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崭新局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很多。2000年以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暨上海行政学院城市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加和承担了大量涉及和谐社会建设特别是城市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课题。本书围绕政党与社会、城市社会发展以及民间组织与社区三方面问题,重点就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与党建新格局的构建、党建新领域的开拓与执政能力的提升、影响上海社会稳定长期积累问题的对策、和谐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加强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对策、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运作、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我们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定能产生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以发挥理论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目 录

导论:改革中期的社会建设议题	1
----------------------	---

第一编 政党与社会

社会利益关系调整与党建新格局的构筑	11
党建新领域的开拓与执政能力的提升	34
新时期充分发挥上海基层党组织作用研究	47
中国工人阶级的内涵、先进性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研究	63
私营企业主对利益分化认识的调查与思考	86

第二编 城市社会发展

影响上海社会稳定长期积累问题的对策思路研究	109
和谐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研究	139
利益分化与整合的东西方研究	157
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理论及其演进趋势	196
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大众价值观念群的互动关系研究	212
治理和促进互联网与社会良性互动研究	226

第三编 民间组织与社区

加强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对策研究·····	241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和培育策略·····	272
我国妇联工作的现代化转型研究·····	293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 社区制·····	315
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和谐运作研究·····	336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	349
后记·····	365

导论：改革中期的社会建设议题

马西恒

法国学者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以一句气势恢弘的话语为他的名著《农民的终结》开宗明义：“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①如果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13亿中国人民奔跑在现代化的征程上，就是中华民族向当今世界以及社会科学提出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间，中国经济焕发的巨大活力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和世界格局转变的新因素，为全球化浪潮增添了新的主导性力量。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不仅使百年来追求的系统性现代化变为现实的民族经历，而且使分化与整合、结构与秩序、体制与前途等吵嚷不绝的近代课题重新排到了时代的前沿。

这是一场在总体性社会基础上发生的整体性变革。总体性社会是孙立平教授用以概括改革开放前30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形态的概念。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国家直接垄断大部分社会资源；二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低，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三是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两层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由此决定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国家与民众之间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等等。这种总体性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必然是整体性的，因为局部的改

^① [法]H.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李培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革不可能解决总体性的问题,或者说,任何局部的改革都可能导致全局性的反应。所以,改革尽管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它所激发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仅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前进,同时也使原来的总体性社会很快地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国家管理开始从集权向放权和分权过渡,地方政府、基层部门和经济组织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社会领域发生了群体的分化、阶层的分化、地域的分化。权力的分化、利益的分化,为中国社会走向多元格局奠定了基础。

始于总体性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使“社会转型”成为学术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概念。陈烽较早地从两个方面对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行了归纳:一是在功能结构方面走向高度分化。党、政、企、社功能分开,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社会各功能系统进一步专门化、独立化、社会组织科层化。二是在利益结构方面,首先,改变等级性、依附性社会关系和封闭结构,形成权利平等的契约性社会关系和开放性结构;其次,社会利益群体进一步分化,社会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显化”;再次,实现利益调节机制的转轨和多元化。^① 这个转型过程的具体机理,则是错综交织的几个不同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提升,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闭关锁国向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融汇。如果我们想到这几个方面在发达国家往往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经历和解决的,那么就不难理解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同时交织,将使中国社会在功能、利益、群体的分化中面对极为复杂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客观背景,而在此过程中权力、利益分化的不平衡则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

分化与整合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体两面。没有分化就没有社会系统的功能提升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没有整合则没有社会系统良性运转所必需的秩序和协同。如果在改革前期我们津津乐道于社会分化的活力和丰富,那么在当前的改革中期阶段,我们就不得不直面它的另一方面,分配秩序混乱、利益矛盾交错、阶层结构失衡、群体突发事件增

^① 陈烽. 略论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J]. 社会学研究,1988.5.

多等问题已经凸显了社会整合的紧迫性。在一个自然演进的社会里，社会整合依靠的或许主要是一套自然平衡机制，但在通过国家改革强力干预社会现代化方向和进程的社会中，实现社会整合无疑需要一个有意识的社会建设过程。

社会建设是一个新近才开始在我国响亮起来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之所以在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得到迅速反响，除了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正式宣告进入新的阶段外，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社会建设的理论自觉。回顾过去 100 年的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东西之争”、经济领域的“先后之争”、政治领域的“道路之争”绵延不断，而自觉的社会建设除了梁漱溟、晏阳初等几位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做过“乡村建设”实验之外，很难说曾经进入过主导决策者的自觉意识。在 1978 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作为改革发起者的国家很早就意识到，经济体制改革能否真正到位最终取决于国家权力结构与政府功能的自身调整，这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的。但是社会领域在国家、市场之外的发育、发展及其现实矛盾，使我们意识到沿着经济—政治的二元路径推进改革实际上是简单化了，现代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需要诚信良善的社会机制作为基础，政府职能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需要均衡有序的社会发展作为功能依托和动力支持。这使我们重新思考，从总体性社会开始的改革与建设，实际上应该是沿着经济—社会—政治的三元路径向前推进的。

显然，社会建设不是为了解决秩序问题而回归国家集权的总体性架构，也不是为了某个阶层或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固定现有的利益格局。社会建设是一个着眼长远，围绕公平和正义的核心理念，在稳定发展活力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体制创新和制度建构的过程。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着眼，我们需要强调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特殊性：一是它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为先导，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为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分化提供了双重动力系统；二是在进行转型和完成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社会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必须以保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这两个方面共同规定了未来中国社会整合

与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同时也决定了未来社会体制建构的基本方向。

“社会治理”概念的引入为实现这样一种制度建构提供了具体的思路。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①在这种制度安排中,社会领域中多元的利益主体将能够共同参与公共管理过程,从而有机会为自身的利益要求说话,同时为公共事务承担输送资源的义务。国家也能够做到既还权于民,又保持自身的权威和主导能力,从而有机会获取更多的“合法性”支持。如此,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纵向承接关系也将出现新的局面。在这种意义上说,治理显然不只是着眼于现实利益格局的认定,更为重要的是着眼于对社会发挥主体地位的支持,对公民和社会组织有权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认可,因此它为一种新的权力布局提供了基本框架。

城市是综合展示转型时期生机与纷乱的综合平台。自2000年以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城市社会研究所依托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及其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优势,对改革中期社会转型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并确立了面向未来、前瞻性的社会建构研究思路。在扩展自身研究领域和参与各方决策咨询课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一批较好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建设和体制创新蔚然成风的热潮下,我们感到将这些成果加以编辑出版,或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本书按照主题分成三编:

第一编为政党与社会,主题是政治社会学视野中的执政党建设。政治权力如何从社会中衍生出来并有所归属,如何在政治领域中被组织成网络并得以结构化,如何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并引导社会的变迁,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要点。作为现代政治的主要承载者,政党的权力和地位取决于社会公众对其合法性认同的程度,而后者

^① 全球治理委员会.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M].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又取决于政党与社会展开互动的形态与成效。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建树历来是卓著的。它不仅善于在保持自己组织体系严密性的同时保持与社会结构的高度融合,而且善于通过群众路线、群众工作进行社会动员,承担社会功能,开展社会工作。始终重视党的建设,始终使自己的基层组织存在于社会组织的序列之中,是取得这种成效的基本保证。但在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形态中,党的组织体系依托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沿着行政条线设置,一方面其运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带上了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另一方面党的建设研究也成为被排他性意识形态掌控的、相对封闭的独立领域。这使执政党建设长期以来孤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在实践中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在理论上凸显了传统党建研究的局限。这使从事党建研究的学者开始放开视野,向政治学、社会学寻求理论支持,而从事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发现了党建领域蕴藏的学术内涵。我们将执政党建设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是基于如下的基本判断:首先,转型过程中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提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来源的命题。基层党组织既承担着反映群众呼声,为党的宏观决策提供民意基础的功能,又发挥着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部分地扮演了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间角色,新形势下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步骤,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次,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在要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外,也提出了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命题。执政党需要根据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发展形势调整自身的组织设置、功能定位、运作机制、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社会也应当为执政党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与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助力和协作,以便推动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的重构,这是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在未来形成新型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关键环节。再次,总体性社会的整体分化向党的组织体系延伸,提出了党的组织体系社会化整合的命题。在新的经济社会格局下,经济、社会组织从一体化的行政体系中脱离出来,依托这些经济、社会组织设置的基层党组织如何整合就成为新的问题。在现实实践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

如跨单位的联合党支部意味着党的基层组织开始从与经济、社会组织重合转向与经济、社会组织交叉,社区党建联席会议意味着党的基层组织开始从依托行政链条实现权力整合转向依托共同利益实现协议整合,使得重构党的组织体系成为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新领域。以上三个判断使我们感到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足以作为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题材。本编收录的5篇报告涉及执政党建设与社会利益整合、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基层党组织的社会作用等课题。

第二编为城市社会发展,主题是城市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结构整合。社会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方法。但对于社会结构重建来说,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是两个最为重要的角度。在阶层结构方面,收入差距、困难人群生活以及“先富阶层”社会作用等问题在当前成为社会热点,突出了社会层级分化的事实。而这种层级分化的存在是否合理、分化的路径是否合理、分化的趋势能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则是引起热烈讨论的根源。在利益格局方面,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冲突与协调、分配秩序与资源配置的优化等方面关涉重大。实际上,阶层结构与利益格局是一表一里的关系,其结构平衡都需要以社会公平作为支撑。因此,社会结构重建重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先富阶层”的收入来源,避免强势群体通过非经济手段谋取超额利益;二是促进社会的横向分化,避免纵向分层成为唯一的社会分化;三是为贫困阶层创造向上流动的条件,扩大社会中等阶层的比重。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使新的社会结构在利益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达成平衡。本编收录的6篇报告主要从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的角度反映了我们的认识,同时包含了社会结构平衡的价值基础、互联网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内容。

第三编为民间组织与社区,主题是实践操作层面的社会建设路径。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社会建设包括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完善社会管理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等方面。但无论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着眼,还是从增强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出发,都需要首先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散乱的社会大众是无所作为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以社区和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培育民间组织,